

《SHUOWENTONGXUNDINGSHENG》

《说文通训定声》

李俊红 著

“段借”研究

“JIAJIE” YANJIU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说文通训定声》“段借”研究

李俊红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文通训定声》“段借”研究 / 李俊红 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56-1158-2

I. ①说… II. ①李… III. ①汉字—古文字学—研究 ②《说文解字》—研究 IV. ①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520 号

《SHUOWEN TONGXUN DINGSHENG》“JIAJIE” YANJIU

《说文通训定声》“段借”研究

李俊红 著

责任编辑 孙志强 冯 蒸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97 千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内容摘要

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是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研究汉字使用的著作。它虽然也以研究《说文解字》作为起点，但编排体例和研究方法都有创新。《说文通训定声》不但依据声音编排字头，而且总结出了假借的“三原”、“四例”、“八用”。尤其是为每个同声通写的假借字找到了所谓“本字”，并援引了大量文献用例作为佐证，成为查考古书假借字的一部最早、最有名的工具书。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乾部作为封闭的字料库，以假借“八用”、特别是其中有“本字”可求的“同声通写字”作为研究对象；整体采用文字学角度和训诂学角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语义作为判断假借的基础；从“本字”下具体例文的分析中探讨所用表述格式中的规律性；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具体的假借字料进行梳理，离析出朱氏假借中所包含的各种性质不同的现象；总结和描述出朱骏声关于假借的若干原则。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假借研究综述；第三章：朱骏声其人及《说文通训定声》；第四章：朱骏声〔段借〕实践概述；第五章：乾部同声通写字；第六章：结语。

序

李国英

清代是我国小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字、声韵、训诂等小学各个门类的研究都有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学者。特别是以小学十大根柢书中“主中之主，重中之重”的《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的《说文》学更是异彩纷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水平。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说文》四大家是清代《说文》学的杰出代表。四大家的代表著作，各具特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采用注疏的体例，用大量的文献证据进一步证明了汉字形义统一原理，充分运用了汉字形音义互求的方法，不仅深得许书之要，也抓住了小学之魂，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广泛征引群书用字实例以证许书，不仅用丰富的文献例证许书，同时客观展示文献用字的历史状况，很切实用。王筠的《说文释例》全面总结了《说文》条例，不仅有助于许书的阅读与理解，同时也揭示了汉字本身的一些重要规律，其中孕育了汉字学的雏形。

四大家的代表性著作中，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更是匠心独运，别具一格。该书打破了《说文》以五百四十个部首分部列字的结构，以古韵分部排列所收之字，便于观察文献用字中的通假关系；首列“说文”一栏，说解本字本义，为判断转注（引申）、假借奠定基础；次列“通训”一栏，为全书的核心，全面说解引申和假借，“以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补充《说文》不具备的引申和假借，全面考察并描写文献用字状况，这正是《说文通训定声》的立意所在，核心所在，重点所在，也是独创所在。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一种新理论草创时的粗疏，着眼点不是在单个字说解的细节，而是在全书的框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说文通训定声》已经初步蕴涵了汉字用字规律的总结，蕴涵了用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的全面总结。汉字记录汉语可以概括为本用、转用、借用三种方式，所谓本用，就是用字记录据以构形的意义（也就是本义）；所谓转用，就是用字记录由本义衍生发展出来的意义（也就是引申义）；所谓借用，就是用字记录该字记录的本词音同或音近的他词。《说文通训定声》的“说文”部分说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于字的本用，“通训”部分的转注说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于字的转用，“通

训”部分的假借说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于字的借用。这样的说解结构,《说文通训定声》虽然尚未作出明确的理论说明,甚至时至今日汉字用字的理论也尚未发展成熟,但是该书却划时代地做出了系统的实践,其贡献甚巨,影响甚大。《说文通训定声》之后的大型汉字历史字典,如《汉语大字典》之类,多采用先解释本义,再解释引申义,最后解释假借义的顺序,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贡献巨大的著作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少之又少,这与其学术地位很不匹配。

李俊红的著作《〈说文通训定声〉“段借”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说文通训定声》“通训”部分的[段借]进行了专题研究。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研究目标明确

作者为本书设立了明确的研究目标,一是总结朱骏声的假借观;二是离析《说文通训定声》一书的[段借]中所包含的不同性质的现象;三是探求假借用字法的一般规律。

二、理论指导正确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用汉字记录汉语有一套独特的用字方法,汉字不仅可以记录据义构形的本义,也可以记录由本义发展产生的引申义,还可以记录与本义没有任何意义关系的同音词,这就是字的本用、字的转用和字的借用,这三者构成了汉字用字的全部原则。本书以上述理论为指导研究《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既符合《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本身的框架结构,也有利于在汉字用字规律的整体中考察字的借用现象,避免了就假借论假借的弊端。

三、重点突出

本书在全面分析描写同声通写字、讹名标识字、单辞形况字、重言形况字、叠韵连语、双声连语、助语之词、发声之词所谓“假借八用”的基础上,以《乾部》为对象重点分析了假借字的主体同声通写字一类,详细地描写了同声通写字中包含的复杂现象,对准确认识《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和进一步理解假借规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假借是汉字用字的一种重要现象,其中蕴涵着复杂的规律。《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假借材料,给假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由于朱骏声自身对假借认识的局限,以及对假借具体处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又给假借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困难。因此,无论是对

《说文通训定声》一书中假借的研究，还是对假借一般规律的探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来讲，本书的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很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持之以恒，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12年10月7日写于北京

前言

《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定声》)的作者是被称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但这本书又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及其他三家的著作在编排体例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不同。首先,《定声》打破了《说文》设540部、据形系联的体例,以声为纲;其次,《定声》把《说文》中脱离了语境的本义研究转变为文献中的本义和假借义研究;第三,《说文》是字本位的研究方法,《定声》基本上是词本位的研究方法;第四,与《说文》以本义和字形为研究焦点(或说以造字和解字为研究焦点)不同,《定声》把字用作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对“转注”、“假借”作了重新的界定,在客观上也保存了丰富的古书假借资料。《定声》是较早地在字用系统中研究假借的著作,它把假借放在本用、转用、借用的系统对比中进行研究,并且把假借的具体实践归纳为“八用”,即同声通写字、讹名标识字、单辞形况字、重言形况字、叠韵连语、双声连语、助语之词、发声之词。

总之,清人朱骏声《定声》一书是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研究汉字使用的著作。它虽然也以研究《说文》作为起点,但编排体例和研究方法都有创新。《定声》不但依据声音编排字头,而且总结出了假借的“三原”、“四例”、“八用”。尤其是为每个同声通写的假借字找到了所谓“本字”,并援引了大量文献用例作为佐证,成为查考古书假借字的一部最早、最有名的工具书。

本书以《定声》乾部作为封闭的字料库,以假借“八用”、特别是其中有“本字”可求的“同声通写字”作为研究对象;整体采用文字学角度和训诂学角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语义作为判断假借的基础;从“本字”下具体例文的分析中探讨所用表述格式中的规律性;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具体的假借字料进行梳理,离析出朱氏假借中所包含的各种性质不同的现象;总结和描述出朱骏声关于假借的若干原则。

本书选题的出发点是基于很多年来对“假借”这一术语使用时的内涵不固定,同一个“假借”术语因应用者不同而有多种分歧甚至彼此矛盾的解说。王宁教授在《训诂学原理》中特地举过“假借”的例子,并总结说:“同称‘假借’,有的指诸多引申义依托同形,也有的是指意义不相关的同音字互相借用。在同音借用中,有的指造字时‘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有的却又指本有其字,同音替代的假借——同一术语表示三种概念,而且,第一种涉及词汇现象,第二三种则纯是文字现象。”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希望从第一部假借专书《定声》出发,对专书和专人的假借进行考察,依据《定声》

对假借实践的分类、为假借字所找的本字、所征引的具体文献材料等等，总结《定声》一书在假借方面的自觉的纂例，探求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在编排过程中对材料下意识地整理中体现出来的自然的纂例。

本书选取《定声》乾部作为字料，以 902 个字头、954 条假借之用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同声通写字 658 条、讹名标识字 104 条、叠韵连语 69 条、重言形况字 60 条、发声之词 16 条、双声连语 15 条、单辞形况字 11 条、助语之词 4 条。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假借研究综述；第三章：朱骏声其人及《说文通训定声》；第四章：朱骏声 [假借] 实践概述；第五章：乾部同声通写字；第六章：结语。

一、本书得出的主要结论

1. 朱骏声确立假借义项的原则

除了朱骏声在自序中明确提出的编则、把与本字无关的意义归入假借义项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一个义项 A 有专门记录它的本字 A'（不管 A' 产生的时间早晚），则这个义项再用其他字 B' 记录时就看作 B' 的假借义，即使这个义项可以由 B' 的本义引申出来。某一母字的某一分化义如果有了专字，这一专字和母字之间的记录职能就完全分化，原母字在记录这一分化义或分化字记录母字本义时的使用义都看做假借义。

2. 朱骏声“必有本字”的原则

朱骏声站在用字假借的立场，明确提出凡假借“必有本字”。实际上在假借八用中有六用在凡例中就已经明确说明没有本字。表面上看来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实际上却正反映了一些自然的纂例：即能求出本字的归入“同声通写字”，求不出本字的归入其他七用。所谓的“本无正字”、“别无正字”其实正是判定“讹名标识字”、“叠韵连语”等的一个必要前提。

3. 朱骏声确定本字的原则

通过实际材料的逐条分析，我们发现了朱骏声确定本字的若干原则：

(1) “借字”和“本字”不必一定具有共同的记词功能。《定声》所求的本字，有时不必非具有借字的意义不可，有的本字与这一假借义之间只是存在可能的意义联系，即朱骏声求本字时有时更侧重的是义源，而不是字源。

(2) 《定声》所求的本字的字形与当前使用义不一定正相契合。有时，《定声》把文献通用字作为本字，而这个文献通用字的字形可能与借字的借义并不契合。

(3) 在朱骏声的假借中，所求的本字不一定和借字同时存在，从文字孳乳的角度来看，《定声》中有的本字是后出本字。

(4) 从数量上来看，《定声》为同一借字在同一文献中的同一借义所求的本字有时不止一个。这也同时证明《定声》本字并不都是形义契合字，因为

形义契合的本字不可能同时有两个。

4. 一些特殊表述格式的内涵

(1) 朱骏声有时在为某借字求出一个本字的基础上，同时还指出另外一个借字，用“A〔段借〕为B，与C同”的表述格式。

(2) 朱骏声在求本字的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俗字，用“A〔段借〕为B，俗作C”的表述格式。

(3) 《定声》有时用“A〔段借〕为B，犹C”的表述格式进行同律互证。

(4) 朱骏声有时在沟通借字和本字关系的同时说明本字的异体字，并用“A，〔段借〕为B，（实）即C”的表述格式沟通。

(5) 朱骏声在沟通借字和本字时有时不能确定为一个本字，所以在其中一个“本字”的基础上用“或为某”来对多本字现象作补充说明。

(6) 朱骏声用“A，〔段借〕为B，实为C”的表述格式同时指出某一假借义的文獻通用字B和形义契合的本字C。

二、本书的不足之处

1. 朱骏声是把假借放在本义、转注、假借的比较中进行研究的，本书虽然较多地把本义、假借义放在一起做对比分析，但对转注义的涉及不够，需要进一步做综合性的研究。

2. 因为954条假借中每条都涉及四五条甚至更多文献用例，为了分析得比较细致，本书只选取了《定声》的乾部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从乾部中体现出来的纂例是否能涵盖其他的韵部还很难说，从乾部材料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还需要其他韵部材料的进一步补充证明等等。

3. 《定声》的〔段借〕涉及很多内容，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题目，比如“连语”、“标识字”等，本身也都非常值得做专题研究，本书对这些小类的分析、描写不够深入。

本书虽然得出了一些结论，但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在读者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最后，由于繁体字和简化字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出于尊重原著和分析字形方便等几方面的考虑，本书对于引用的文献原文或行文中的字例，均使用了繁体形式，特此说明。

李俊红
2012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1.1 选题依据/ 1
- 1.2 研究目标/ 5
- 1.3 理论依据/ 7
- 1.4 工作程序/ 8

第二章 假借研究综述 / 11

- 2.1 假借的缘起/ 11
- 2.2 假借是“本无其字”还是“本有其字”/ 13
- 2.3 对假借“造字”的不同理解/ 17
- 2.4 “假借字”所记录的意义范围/ 19
- 2.5 假借是音借、义借还是形借/ 23
- 2.6 其 他/ 24

第三章 朱骏声其人及《说文通训定声》/ 28

- 3.1 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简介/ 28
- 3.2 《说文通训定声》对假借的研究/ 34

第四章 朱骏声〔段借〕实践概述 / 39

- 4.1 同声通写字/ 40
- 4.2 连语/ 45
- 4.3 托名标识字/ 56
- 4.4 形况字/ 64
- 4.5 发声之词、助语之词/ 69
- 4.6 其他标注/ 74

第五章 乾部同声通写字 / 79

- 5.1 考察方法和步骤/ 79
- 5.2 《定声》乾部对同声通写字材料的具体处理/ 90
- 5.3 同声通写字单向一对一例考察/ 94
- 5.4 《定声》乾部〔段借〕中几种特殊表述格式/ 114

5.5 《定声》的“本字”和“正字” / 130

第六章 结 语 / 137

6.1 朱骏声的假借原则 / 137

6.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146

主要参考文献 / 150

后 记 / 156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依据

1.1.1 假借字在古代文献中大量存在

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对汉字的使用并非总是用本字本义，有时根据某种需要会选择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假借字来代替本字使用。就如陆宗达、王宁在《训诂与训诂学》中所说：“古代文献用字时并不完全按造字初期那样只写本字，而往往依照它的声音选择一个后出字甚至假借字来写。”^①

假借的做法不是偶然的，在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逸周书》：“揚舉力競。”王念孙案：“‘競’古通作‘竟’，不烦改字。”^②《汉书》：“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王念孙案：“‘恨’读为‘很’，忤逆也。很，违也。谓与王凤相违逆，非谓相怨恨也。”^③《汉书》：“盡備厥辜。”王念孙案：“‘備’读为‘伏’。《汉书》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读如匍匐之‘匍’，故字亦相通。”^④此外如以“蚤”代“早”、以“信”代“伸”、以“荷”代“何”、以“颂”代“讼”等都已经都是公认的、典型的假借用例。

一些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也为假借法在文献中大量使用的事实作出了很好的证明。刘又辛《通假概说》一书以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触龙见赵太后章》的一段文字为例，一一列出了其中的假借用字，其中如借“宵”为“肖”、借“胃”为“谓”、借“汲”为“及”、借“棚”为“崩”、借“若”为“诺”、借“次”为“恣”、借“氏”为“是”等。^⑤孔德明列举了帛书《战国策》和银雀山竹简《孙臧兵法》中的例子如“勺”通“赵”、“鱼”通“吾”、“忍”通“仁”、“乾”通“韩”、“守”通“兽”、“卢”通“虑”、“读”通“独”、“术”通“屈”等。^⑥

①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第 21 页。

② 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一册《逸周书第一》，北京：中国书店，1985，第 1 页。

③ 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五册《汉书第八》，北京：中国书店，1985，第 41 页。

④ 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七册《汉书第十五》，北京：中国书店，1985，第 17 页。

⑤ 刘又辛.《通假概说》，成都：巴蜀书社，1988，第 2—4 页。

⑥ 孔德明.《通假字概说》，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第 97 页。

根据郑振峰对甲骨卜辞的测查,在作为测查对象的1481个字中,有假借字1229个,占字料总数的83%。^①

可见,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从现有材料的实际用字情况来看,假借字都是大量存在的。^②

1.1.2 假借字的存在使形义关系脱节、字词关系复杂化,给阅读古代文献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从构形原则的角度判定文字性质,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是根据词的意义来构造文字形体的。这种据义构形的特点也决定了人们在对汉字进行理解时很容易从形义关系的角度进行推求。根据陈宝国等关于汉字识别的实验结果,在汉字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中,不管是高频字还是低频字,字形都最先被激活。^③这说明汉字认知首先是从视觉刺激中抽取出汉字特征进行加工,即字形是汉字加工的第一阶段,并且这种加工不受字频因素的影响。而假借字由表意符号到表音符号,中间经历了一个语音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音刺激被强化、视觉特征被淡化,汉字作为表意符号时所具有的一些语义属性也随之被隐藏,形体和语义之间的可推论性消失。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汉字构形与字用的矛盾,汉字本来协调一致的形义关系也因此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假借用字法打破了汉字形义相关的绝对性,使得汉字的记词职能不再单一。一字多职的情况也使得字、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复杂化。如《史记》:“杀隐幽友,大臣洞疑。”《索隐》以“洞”为“洞达”义、“洞疑”即“共疑”。王引之曰:“《索隐》以‘洞疑’为‘共疑’,其说迂而难通。‘洞’读为‘恫’,恫疑,恐惧也。言吕后杀隐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④这样一来,汉字“洞”就承载了完全无关的两种意义:洞达、恐惧,而“恐惧”义又与“洞”的形体没有关联,形成了一字多词现象;反过来,对于“恐惧”一义,则既可以用本字“恫”来承载,也可以用借字“洞”来记录,又造成了一词多字现象。

形义关系的脱节、字词关系的复杂化使得读者在解读古代文献时比较容易因习惯性地“望文生义”而对文献内容产生误解。所以,假借字的存在历来

① 郑振峰.《论甲骨卜辞中的假借现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6—40页。

郑振峰.《从甲骨文看上古汉语中的假借现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10—114页。

② 除了文献用字中的同音替代,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第132页)还注意到许慎在推求字形结构和说解字义时也不全受字形的束缚,有时用假借字,如许慎对于“咸”字的字形分析。《说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段注》:“戌为悉者,同音假借之理。”文字构造中同音假借的现象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所以正文中没有涉及。

③ 陈宝国,彭聃龄.《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I).《心理学报》,2001年第1期,第1—6页。陈宝国,王立新,彭聃龄.《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II).《心理学报》,2003年第5期,第575—581页。

④ 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三册《史记第六》,北京:中国书店,1985,第61页。

是阅读古籍的障碍,也造成了后世传注的多种歧说和语言纷争,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学习、普及和传播。^①

同时,假借的表音倾向也使得一些学者对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是否能坚持表意性产生了怀疑。如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就曾经说过:“表意文字很容易变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终于变成了表示孤立的声音的符号。”^②

1.1.3 “破假借”是解读古代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假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假借为阅读文献所带来的障碍非常明显,“先儒所以颠沛沦于经籍之中,如泛一苇于溟渤,靡所底止,皆为假借之所魅也。”^③王念孙曾经有关于假借的经典论述:“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音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④

对于词汇的习得和教学,假借同样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俞敏《古汉语词汇教学》一文从教学的角度抽取了一百个古汉语常用词进行测查,其中有23%的词俞先生认为“不是靠讲授能解决的。只有勤翻勤查才可以逐个逐步掌握。”^⑤而被俞先生归入23%范围内的三类难以掌握的词都与假借有关。

由于假借是“依声”的,借鉴“依声”的原则,我们在汉字汉语研究中就多了一种不拘于形体的思路。有些现象,仅从字形的角度考虑好像没有关系,但实际上通过声音可以联系在一起。如《楚辞》“鲜卑”(指带钩),《战国策》作“师比”,《史记·匈奴传》作“胥比”,《汉书·匈奴传》作“犀毗”等^⑥。如果不靠声音,就不能判断出这些形体毫无关系的汉字其实是同一种物件的记录。

假借是用汉字书写的文献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假借用字,虽不宜生今反古,然欲通知古训,则此例必不可不知。”^⑦破假借是别词的重要工作,也

① 当然,假借并不是造成古书难读或曲解的唯一原因。其他如字体的演变、书写工具的改革、传抄的讹误、语法的发展等等都会对正确理解文献原义产生障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54):“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也。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筍可食,归而煮其簍也。”

②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51页。

③ (宋)郑樵:《通志》第一册《六书略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影印),第503页。

④ 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第2页。

⑤ 俞敏:《古汉语词汇教学》,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学术之声》(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⑥ 此例采自胡适:《辞通·序》,见朱起凤:《辞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6页。

⑦ 吕思勉:《字例略说》,见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202页。

是解读文献的重要工作，假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假借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多次形成高潮，研究成果也不乏其数，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够透彻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对“什么是假借”的判断，各家有自己的标准。即“假借”的内涵并不固定；

(2)对在不同标准基础上形成的矛盾观点简单地给以是非判断。即用自己或某一家的观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判断其他人所谓“假借”的对错；

(3)针对某一封闭材料进行的综合研究还比较少。即缺乏从具体语料出发的、对某一家假借观进行描述的专门研究。

其中，特别是在明确理论指导下对某一专书(文献或字书)的描述性研究还非常缺乏，这也是我们继续研究假借的工作重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远程教学的目标也再一次为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者提出了沟通假借关系的课题。

本书即是以专书作为依托，目的在于通过对具体语料的分析，描写出专书判定假借的原则，并试图探讨此原则形成的背景或原因。同时再回头用这些原则来检验专书的假借实践。属于语言史中假借研究的一个横断面。

1.1.4 《说文通训定声》是研究假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以下或简称《定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4年版。下只标页码者同)中强调了假借研究的重要性：“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P4 自叙)

后人读古书，有时明明知道某个字是假借字，但遍检群书仍然不能寻找到这个假借字的本字。而朱骏声“独平生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导音韵之源，发转注之冢，究假借之变，小学之教，斯焉大备。识字后能通经，通经后能为文，实学人词人不可少之书，而古人今人未始有之书，所谓似因而实创者于是乎在。”(P 27 谢跋)“朱书每字博收假借之义，每一假借义必指其本字以当之”^①，可以作为一部假借字典来使用。“朱全书中所举之假借，悉有本字以当之。朱氏此种说解是否的确，吾人不必遽下评语。但此说即不的确，亦不损其全书之价值。”^②

《定声》一书基于《说文》，但有述有作、有破有立，研究《说文》，却又不囿于《说文》，在前贤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许慎的“转注”和“假借”作了重新的界定。《定声》既在客观上保存了丰富的古籍假借材料，又便于查检本字以

①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第380页。

②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第366页。

及与转注义相比较,对训诂研究和古籍研读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胡适在《辞通·序》中评价《定声》时说:“(《定声》)体例与方法都稍胜前人:体例是一部表示声音与训诂变迁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创见的辞书;方法是特别注重‘转注’与‘假借’,用为训诂演变与形声变异的原则。”李雄溪认为“朱氏单单在搜集和铺排假借材料的贡献,已足以使《通训定声》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①朱星在《古反语概论》一书的第四章后附了一份《假借字表》,特别说明“本表主要是根据朱骏声所著作一摘要”,“以便今后读古书时,可主动地扫除文字上的障碍”,^②并评价《定声》为“一般查考古书中假借字的一部最有名的工具书”。^③

与王念孙、王引之等从训诂角度、以举例性质研究假借不同的是,朱骏声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论意识和系统意识。《定声》是第一部在字用系统中研究假借的著作,书中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假借字料,而且把假借放在本用、转用、借用的系统对比中进行研究。通过《定声》所提供的假借材料,可以让我们对古书假借字的使用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选择《定声》作为研究假借的切入点。

1.2 研究目标

1.2.1 以《定声》为对象总结朱骏声的假借观

对《定声》作者朱骏声的假借观进行客观描写和总结属于学术史研究的目标,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工作任务。

“假借”是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六书”之一。最早对“六书”作出系统阐释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对“假借”的界定是:“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因为许氏给与六书的界说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所举的例子,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所以后来人的解释,人各一词。”^④后世学者多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分析许慎的假借说,并给“假借”赋予不同的内涵。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假借定义和原则的讨论而言,就有“音借说”、“引申说”、“互补说”、“形架笔画说”、“全备说”等五种。^⑤

王宁在讨论“传统训诂学在术语问题的得失”这一问题时说道:“一部分术

① 李雄溪.《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第114页。

② 朱星.《古汉语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第473页。

③ 朱星.《评〈说文通训定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第45—49页。

④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70页。

⑤ 何丹.《建国以来关于假借理论的讨论》,《语文导报》,1986年第8期,第44—46页。